

偏堡文化陶器分期及其相关问题^{*}

张星德

(辽宁大学, 沈阳, 110036)

偏堡文化以沈阳新民偏堡沙岗遗址的发现命名^[1], 其陶器以红褐色夹砂陶为主, 杂以云母、滑石等颗粒, 手制, 器型规整, 器物群主体由叠唇罐、深腹罐、直腹罐和壶、钵组成。目前已经发现的典型偏堡文化遗址主要有新民县偏堡子、高台山^[2], 沈阳新乐^[3]、肇工街^[4], 瓦房店长兴岛三堂遗址^[5], 交流岛蛤皮地遗址^[6]和沈阳乡猴山遗址^[7]等。受其影响的窄条堆纹装饰等在大连市郭家村遗址^[8]、大连市大潘家村遗址^[9]、大连小珠山遗址^[10]、内蒙古奈曼旗大沁他拉遗址^[11]、内蒙古扎鲁特旗南宝力皋吐遗址^[12]、本溪满族自治县马城子洞穴遗址^[13]、岫岩北沟西山遗址^[14]、丹东石佛山遗址^[15]均有分布。可见其分布范围之广泛, 影响之大。

虽然偏堡文化的发现已经有50余年的历史, 但是一直以来受遗址点堆积较薄、遗物相对少、公布材料不完整、陶器器型比较单一、缺乏地层关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使学界对其的了解, 尤其是年代、谱系关系及分布等问题一直缺乏清晰的认识。就最早发现偏堡文化遗存的沈阳地区而言, 新乐下层文化与偏堡文化虽地层顺序清晰, 文化有一定联系, 且有观点认为后者来源于前者^[16], 但从目前已有的¹⁴C数据看, 二者时间间隔上缺环明显。三堂等遗址的发现使人们对偏堡文化有了新的认识, 三堂遗址的地层关系表明, 含条形堆纹陶器的一期遗存早于相当于小珠山上层文化的二期遗存, 结合郭家村等遗址出土的似偏堡文化的堆纹陶片, 一般认为三堂遗址报告中的一期文化大体相当于小珠山中层时期或略晚些, 因此虽早有学者从地理分布及窄条堆纹等因素考虑, 提出偏堡文化的来源与山东地区古文化有关^[17], 而山东地区具有上述特征的北辛文化距今约6300年, 二者年代差距极大, 使得上述研究也未能进一步深入下去。

本文拟从对偏堡文化典型遗址陶器的分型分式及分期入手, 试图对该文化年代及谱系等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认识。本文分析标本主要选自偏堡子、高台山、肇工街和三堂遗址。

^{*}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项目号 L07BKG001)。

一、陶器分析

1. 罐

偏堡文化的罐主要可以分为三种，即饰附加堆纹叠唇罐、大口直腹罐和大口深腹罐。

（1）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

按造型可以细分为四个式别（图一）。

I式：包括三堂遗址IIF3下：23、IIF3上：12、IIF3上：13、IIF3上：19。夹滑石红褐陶。微侈口圆唇，口沿外附加堆纹，堆纹上缘与唇沿有一定距离（一般在5毫米以上），腹上半部饰竖向窄堆纹，其下再饰一周横向附加堆纹。唇下堆纹从下腹部即开始外鼓，腹部最大径在腹上部三分之一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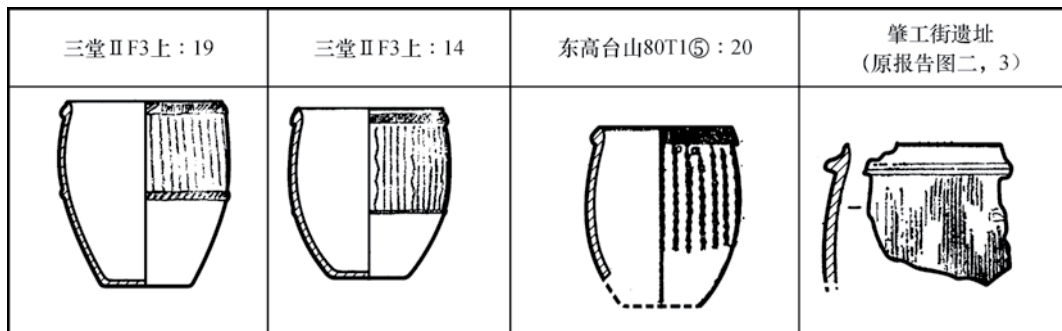
II式：三堂IIF3上：14。夹滑石红褐陶或夹砂红褐陶。口沿内壁抹斜呈微侈口，扁平附加堆纹上缘抹平且与唇沿距离较小。其下腹壁外鼓，腹部上半部略大，饰竖向堆纹，其下或再饰一周横向附加堆纹。腹部最大径在腹中部器高的二分之一处。

III式：包括三堂IIT202⑤：7、三堂IIT302⑤：12、东高台山80T1⑤：20、高台子报告图一的5^[18]。夹滑石红褐或褐陶。口稍侈，口下饰一周附加堆纹，堆纹与唇沿连为一体，整个唇部呈三角形，口沿内壁抹斜呈微侈口。腹部饰竖向窄附加堆纹或在每两弧曲窄条堆纹之间再饰三至五条刻划纹，竖向堆纹下或饰一周横向附加堆纹。腹中部微鼓，腹部最大径向下在器高的二分之一以下或接近三分之一处，整体器腹呈近椭圆形。

IV式：肇工街遗址原报告图二的1~3、5。口部堆纹与口缘连成一体，并形成下缘外撇的叠唇，口沿内壁抹斜已经不明显。腹壁垂弧，饰纵向篦划纹。

（2）大口直腹罐

大口直腹罐未见有完整器，仅在高台山遗址发现一件（可复原约三分之二），是目前该类器物中保存最完整者，其余的均为口沿残片或附带很少部分腹壁残片，但却是偏堡文化各遗址中都普遍出土的器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式别（图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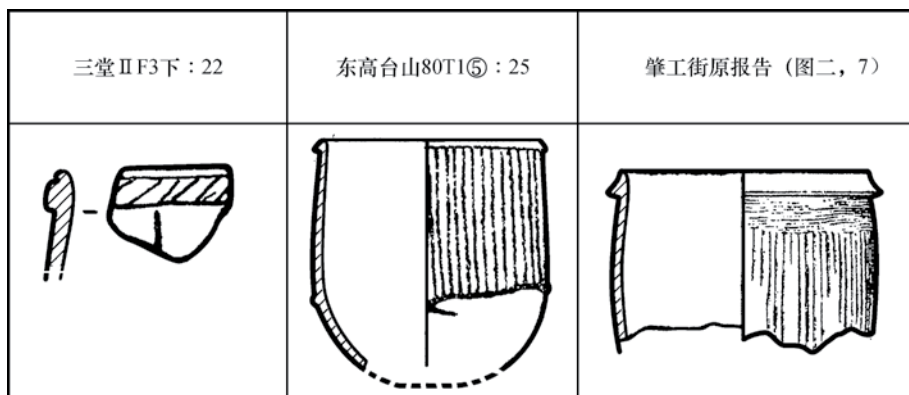


图一 偏堡文化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

I式：包括三堂IIF3下：22^[19]、IIF3下：20。夹滑石红褐陶。口沿下距口沿一定距离处饰一周附加堆纹，附加堆纹突起部分较宽，腹壁斜呈微敛口。

II式：包括三堂IIT104⑤：15、IIT302⑤：12、IIT302⑤：11，东高台山80T1⑤：25、80北扩⑤：9、80T1⑤：18。夹滑石红褐或褐陶。口部附加堆纹与口沿合为一体呈叠唇，附加堆纹突出的部分较窄，上腹直，腹部二分之一处微向外鼓后收小底，腹上部三分之二饰竖向泥条堆纹，下饰一周横堆纹。

III式：肇工街原报告图二的7，口部附加堆纹与口缘合体，堆纹中部凹陷、外缘外撇，内唇部外侈，口沿下饰数道划纹，其下再饰竖向篦划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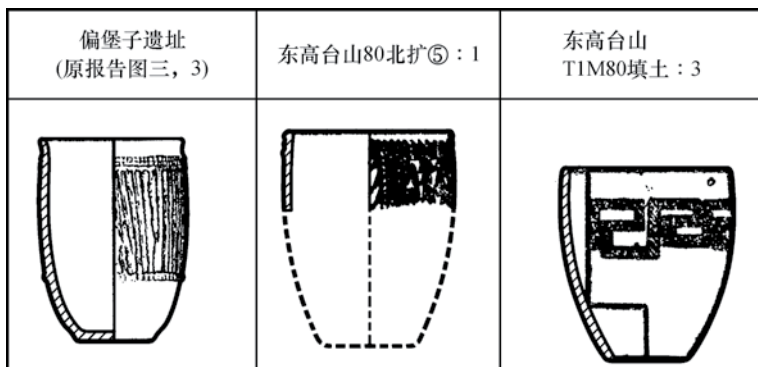


图二 偏堡文化大口直腹罐

（3）大口深腹罐

仅见于高台山和偏堡子遗址，分别为偏堡子遗址原报告图三的3、东高台山80北扩⑤：1、高台子报告图一的6^[20]和东高台山T1M80填土：3。可分三式（图三）。

I式：偏堡子遗址原报告图三的3、高台子报告图一的6^[21]。细砂红陶。直口或微外侈，口沿下饰两或三周附加堆纹。高台山报告图一的6饰“人”字形划纹，偏堡子遗址原报告图三的3腹饰泥条堆附的竖向条纹，其下再饰一周横向堆纹，上腹壁较直，下



图三 偏堡文化大口深腹罐

腹壁微外鼓,腹部最大径靠近下腹,器高约等于两个口径长。

II式:东高台山80北扩⑤:1,夹砂红褐陶。直口,口部下饰三周锥刺长圆窝纹,腹饰竖向按压泥条纹组和划纹,上腹壁较直。

III式:东高台山T1M80填土:3,夹砂红褐陶。敛口,深腹,腹上部饰一周方折回曲纹带,内划斜线,上腹壁微鼓,之后弧向内收成小平底。器高约为1.5个口径长。

2. 壶

壶是偏堡文化的另一种指征性器物,陶质绝大多数为夹砂或夹云母,只有极个别为夹滑石陶或泥质陶。从造型特征看,可以分为五式(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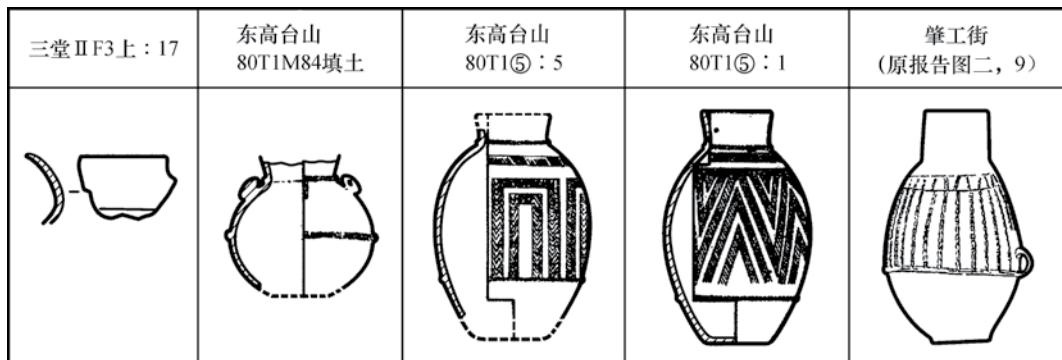
I式:三堂IIF3上:17、三堂IIF3上:18。短颈,颈壁斜弧曲外翻呈敞口,后者颈肩交界处有一周堆纹。

II式:东高台山80T1M84填土出土。短颈,颈壁斜直,颈肩交接处饰一周附加堆纹,肩部有半环形穿孔小耳,球腹,且围以一周附加堆纹。

III式:包括三堂IIT203⑤:11、IIT104⑤:12,东高台山80T1⑤:2、80T1⑤:5、80T1⑤:15。短颈,斜直颈壁下半段趋直,颈肩交接处有一周附加堆纹,长圆腹,腹部较鼓,无耳,腹部饰几何形刻划纹,刻划纹下复饰一周附加堆纹。

IV式:包括三堂T102⑤:9、东高台山80T1⑤:1、肇工街原报告图二的8。颈部加长,斜直颈壁下半段趋直,颈肩交接处有一周附加堆纹,溜肩,腹部呈瘦长椭圆形,饰几何形刻划纹或竖向附加堆条纹,纹饰下复饰一周附加堆纹。在三堂遗址发掘报告中文字记载出土有与东高台山80T1⑤:1器身纹饰一致的陶壶腹片,但未公布图片及器物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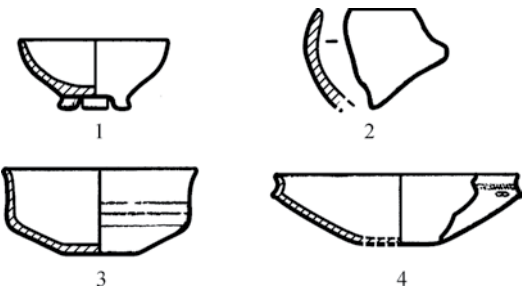
V式:肇工街原报告图二的9。直颈,颈部较长,下斜肩,长椭圆腹,腹部饰竖向附加堆条纹,纹饰下复饰一周附加堆纹。环形器耳。



图四 偏堡文化大口陶壶

3. 钵

在目前确认的偏堡文化遗址中，均有出土钵类的报道。从发表器物较为详细的三堂遗址看，钵类形制并不单一，至少可以区分为曲腹钵和折腹钵（图五）。但在沈阳地区的发掘报告中多没有就其形制做详细描述。如高台山遗址，报告中仅提“器类有壶、罐、钵等”，既无具体器形说明，也没有图发表，故虽无法进行具体的型式区分与排比，但不失为该文化一个主要器类。



图五 偏堡文化大口陶钵
1. 三堂IIT202⑤：12 2. 三堂IIT104⑤：13
3. 三堂IIT104⑤：11 4. 肇工街（原报告图二,10）

据瓦房店三堂遗址发掘报告：“其第5、6层出土腹饰窄细条堆纹、口沿外饰附加堆纹的筒形罐和颈部饰附加堆纹的壶为代表的器物群。F3位于T302南部第5层下，室内有两层堆积，上层为黑色土夹大量蚌壳，厚约40厘米左右，下层为房屋倒塌后的堆积”。这样，三堂的地层关系说明了F3遗物要早于地层第5层中的遗物。

新民东高台山遗址地层根据报告描述，共分为6层，第5层为褐色土，厚15~20厘米，陶片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夹滑石红褐陶、黑灰陶也占有一定数量。陶片多划纹和附加堆纹，器形有壶、罐、钵等。第6层黄土，厚3~7厘米，出土夹砂褐陶片，纹饰均属压印纹、器形仅见直口深腹罐类。再下为生土。从报告发布的地层剖面图观察，第4层下的墓葬同时打破第5层和第6层。这样，东高台山的地层关系说明了第6层遗物早于第5层，第4层下墓葬填土出土物早于第5层和第6层。

表一 偏堡文化陶器分期表

器 物 单 位	叠唇附加堆纹 深腹罐	大口直腹罐	大口深腹罐	壶
三堂F3下层	I	I		
三堂F3上层	I、II			I
偏堡子遗址		II	I	
东高台山T1M84填土				II
东高台山T1⑤	III	II	II	III、IV
三堂第5层	III	II		III、IV
东高台山 T1M80填土			III	
肇工街遗址	IV	III		V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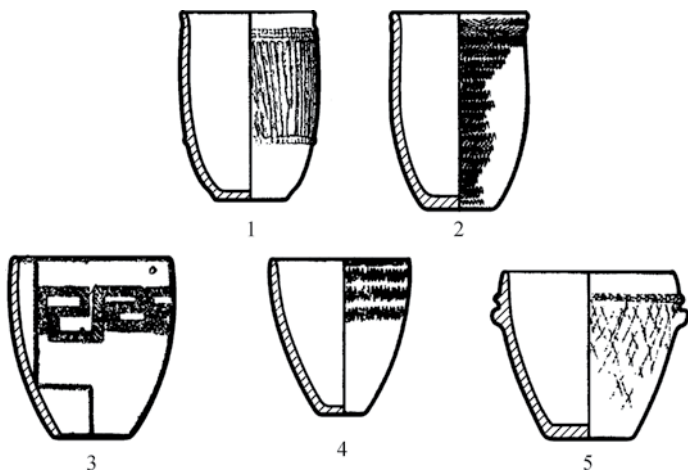
尽管已经发掘的偏堡文化遗址可利用的层位关系很少,但据上述已知情况看,并没有与类型学排序相违背。

我们将上述器物序列中各型式在不同地层单位中的共存情况列表,从表一可以清楚地看出,表中的四个遗址八个单位至少可以分成三个组合,代表了偏堡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或称做三期。纵观各期器物组合情况,表现出较为清晰的阶段性差异。

早期以三堂遗址F3为代表。陶质普遍加滑石粉,以I、II式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I式大口直腹罐和I式壶及钵为组合,器型较为单一,大口深腹罐尚未出现。纹饰以附加堆纹占大宗,纵向堆纹有直线或直线与波曲线条相间之不同,划纹仅见在纵向堆纹间或横向堆纹之上的平行线,尚未出现复线几何形划纹图案。从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看,F3的上下层还有细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段的可能性,鉴于目前发表的标本数量有限,暂不予考虑。

中期包括偏堡遗址、东高台山T1第5层及M84填土中部分遗物、三堂遗址第5层。陶质除加滑石陶外,还出现了夹砂陶;以III式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II式大口直腹罐、I~III式大口深腹罐和II~IV式壶及钵为主要组合,同时还伴出少量碗、孟等。器表装饰的纵向附加堆纹泥条间距有加大趋势,并且更似绳索状,数道竖泥条间以波状泥条的装饰手法流行,还有泥条间以划纹、乳钉等配合装饰,流行复线几何形划纹内填短划纹的图案,其中以复线三角形、“回”字形及方格多见,还见有施加陶衣的陶器。从I、III式大口深腹罐分别与新乐下层文化^[22]及红山文化晚期或小河沿文化早期同类器形相近的事实来看(图六),该阶段年代跨度较大,尚有进一步划分的可能。

晚期以肇工街遗址为代表,陶质有加滑石陶和夹砂陶,器物以IV式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III式大口直腹罐和V式壶及钵为主体组合;口部附加堆纹中部下凹,纵向堆纹泥条加粗、间距加大,多做成绳索状,其间除划纹外,还见有乳钉纹等装饰,出现了篦划纹,部分陶器施加有陶衣。



图六 偏堡文化和新乐下层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的大口深腹罐

1. 偏堡子遗址(原报告图三,3) 2. 新乐F2:3 3. 东高台山T1M80填土:3 4. 牛河梁H1:1 5. 石棚山M32:2

二、年代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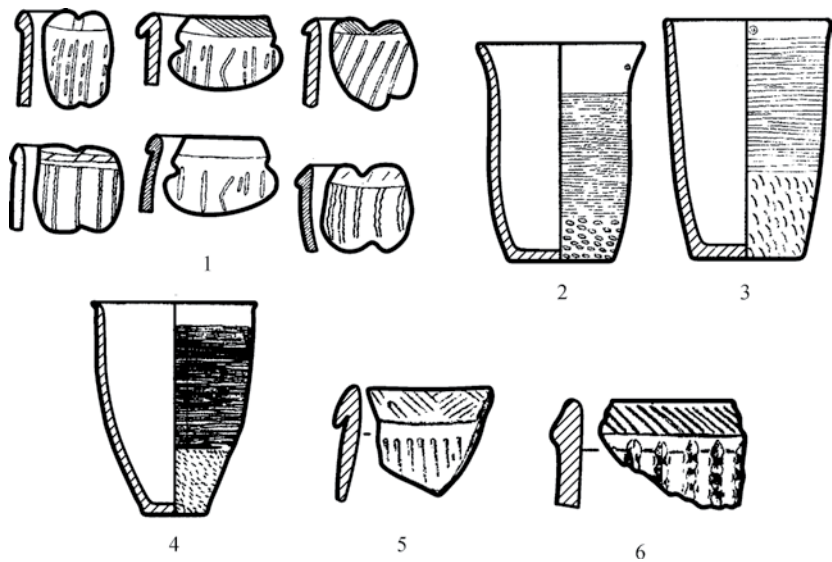
以上文分期为标准,通过考察东北南部地区其他与偏堡文化相关器物,我们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偏堡文化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的信息。

马城子遗址B洞MBT1③:60大口深腹罐,口沿外施有附加堆纹横带,横带上再饰凹坑麦粒纹,器腹部通体施纹,为竖条附加堆纹间以刻划纹^[23](图七,3)。

北甸A洞BAT1③:11叠唇罐,口稍侈,口下饰一周附加堆纹,堆纹与唇沿连为一体,使整个唇部呈三角形,口沿内壁抹斜,腹部饰长短不等的直或折状附加堆纹。BAT1③:16、BAT1③:12、BAT1③:15、BAT1③:13、BAT1③:14直腹罐,直口,口沿处附加堆纹,堆纹与唇沿连为一体呈三角形叠唇,腹壁直^[24](图七,1、2)。

张家堡A洞ZAT6⑤:10,陶胎中含有大量蚌壳粉,壁厚,表面施加有绳索状纵向附加堆纹^[25]。

上述三遗址地层中与偏堡文化相似陶器共存的、可辨认器形的均为陶罐类,依造型主要区分为直口和敞口两种。前者一般器腹比较深,口径与底径大小差别较为明显;后者器体近似长方形,腹壁微外鼓。陶器表面普遍施加有纹饰,并且流行一器同时配合使用两种纹饰的做法。纹饰主要见刻划纹,样式有横线、“人”字、网纹、交叉、短线等,此外还见有凹坑纹、指甲纹等。这些特征与后洼上层文化早期^[26]相似,其年代应当相近(图七)。



图七 北甸A洞、马城子、后洼上层、偏堡、高台山遗址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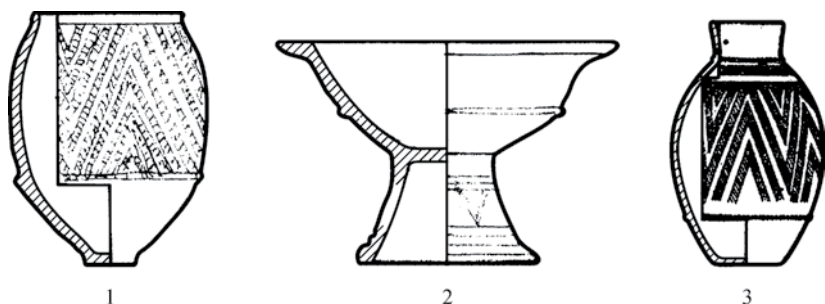
1. 北甸(BAT1③:16、BAT1③:12、BAT1③:15、BAT1③:13、BAT1③:11、BAT1③:14) 2. 北甸T1③:50 3. 马城子(M)BF1:13 4. 后洼IT8②:88 5. 偏堡子研究论文(图一二,5) 6. 东高台报告(图六,2)

郭家村遗址73T1④:202孟,器表饰绳索纹缀珠纹^[27]。

郭家村遗址出土上述堆纹孟的地层中还共出有罐形鼎、平底鬲和矮足豆,时代接近半坡四期文化。

北沟遗址T3③:77侈口罐,器表饰复线三角形内填以短斜线纹^[28](图八,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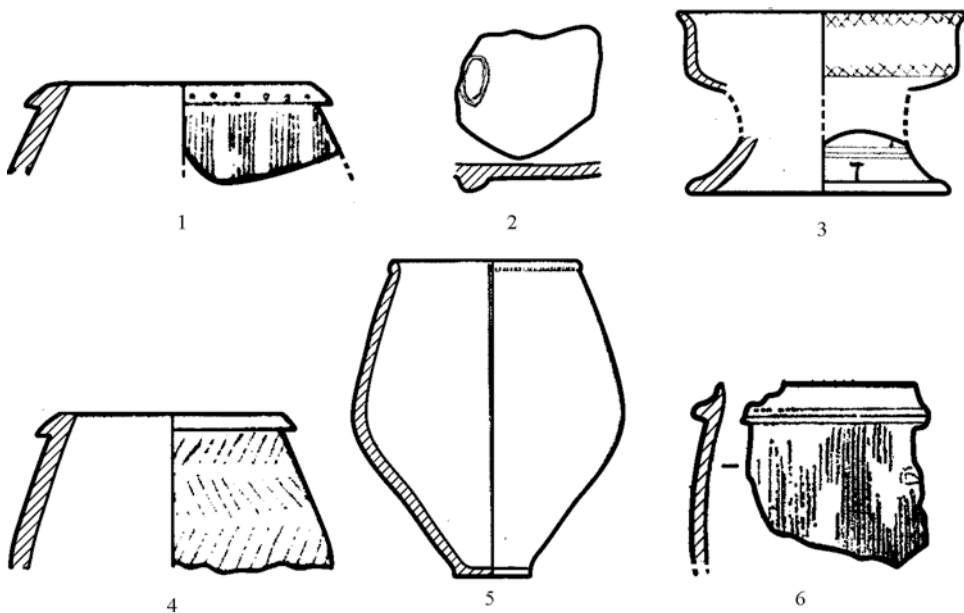
该地层中还共出有敛口罐、折沿罐和浅盘豆等遗物,其中浅盘豆平折沿,盘腹中部饰突棱纹,喇叭形圈足,足上有弦纹和三角形镂孔,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豆特征一致(图八,2),叠压在该层之上的第二层出土有龙山文化时代三环足盘。



图八 北沟、高台山遗址陶器

1. 北沟T3③:77 2. 北沟T3③:79 3. 东高台山80T1⑤:1

石佛山IT4:36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29]、石佛山采集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30],口沿内壁抹斜呈微侈口,口部附加堆纹与器口上缘抹平使其呈三角形叠唇,腹壁外鼓,腹部最大径在腹中部器高的二分之一以下(图九,5)。



图九 石佛山、肇工遗址陶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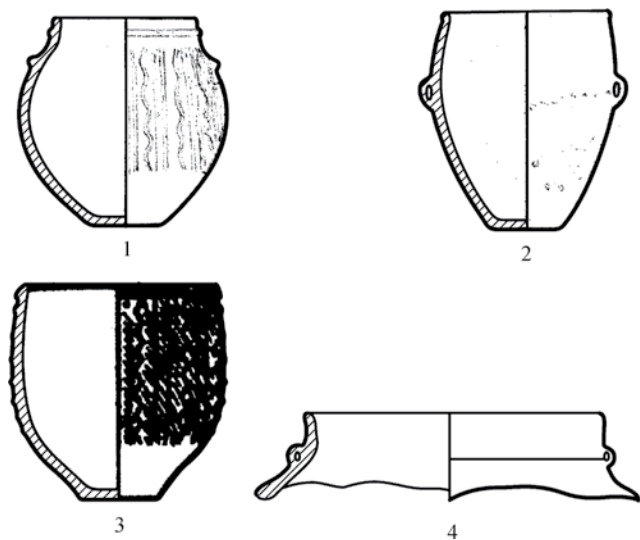
1. 石佛山IT3:19 2. 石佛山IT4:48 3. 石佛山IT2:7、石佛山IT3:3 4. 石佛山IT3:20 5. 石佛山IT4:36
6. 肇工街遗址(原报告图二,3)

石佛山IT3:19、IT3:20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口部堆纹与口缘连成一体，并形成下缘外撇的叠唇，口沿内壁抹斜已经不明显，腹身饰纵向梳齿纹或横向平行短斜线纹（图九，1、4）。

石佛山遗址与上述叠唇罐共出的陶器还有小口鼓腹壶、豆、碗、扁凿足盘、板耳、锯齿花边底等，其特征与小珠山上层文化相一致。时代相当于龙山文化时期（图九）。

新近公布的大连小珠山遗址第四期陶器反映的偏堡文化特征基本与石佛山遗址相若。

大沁他拉遗址福盛泉地点F6:029夹砂罐，直口、短颈，颈肩交界处饰一周绳索状附加堆纹，鼓腹，腹部饰波曲形夹竖条形纵向附加堆纹^[31]，造型特征与高台山80T1M80填土:2近似，装饰风格完全与东高台山80T1⑤:3一致。该地点未经发掘，采集品中共出有小河沿文化陶罐（图一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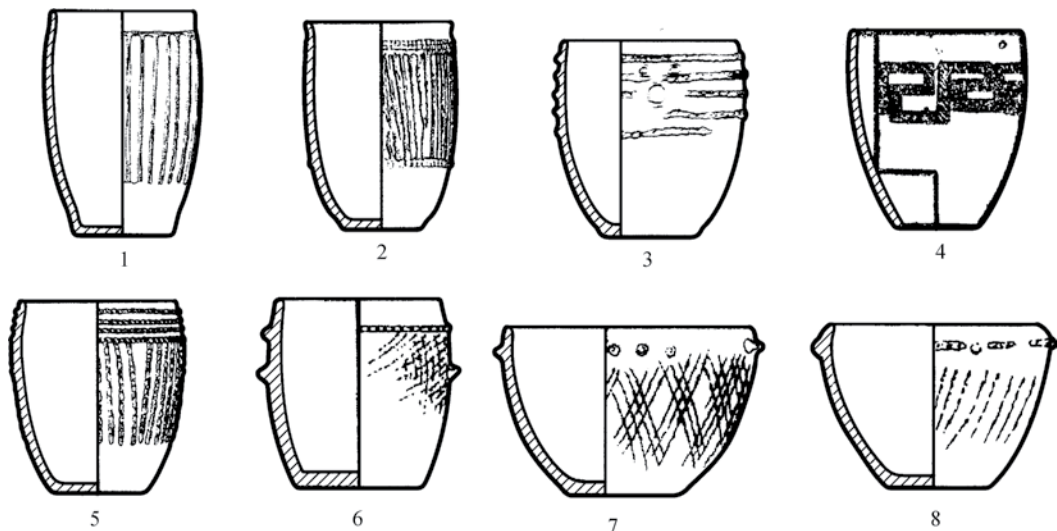
图一〇 大沁他拉、高台山遗址陶器

1. 大沁他拉福盛泉6:029 2. 大沁他拉福盛泉6:025 3. 东高台山80T1⑤:3 4. 东高台山80T1M80填土:2

内蒙古南宝力皋吐墓地陶器面貌与偏堡文化的关系相对上述各遗址都要复杂，尤其条形附加堆纹筒形罐、叠唇罐、复线几何纹样等因素，甚至原报告认为：“其中相当数量的陶器还像是辽宁新民偏堡子类型同类器物的再现”^[32]。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原报告发表的陶器遗存做一个分析，厘清不同文化元素，只有这样才能够更为清晰地认识其中的偏堡文化因素，并探讨其年代问题。

就原报告发表的器物图及文字描述看，南宝力皋吐墓地的罐主要分两种，其一为深腹罐，其二为叠唇罐，其中前者又可以根据腹部是否为深筒状分为二型，即直筒形深腹罐和大口深腹罐，大口深腹罐大口，腹壁外敞，流行口沿下贴附一周乳钉，为典型的

小河沿文化器型；直筒深腹罐在小河沿文化中没有传统，在偏堡文化中其因新乐文化影响而出现，并随着与西部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接触器型发生变化，在偏堡子遗址看到的同类器（原报告图三，3）口沿下饰数周横向附加堆纹，腹饰泥条堆附的竖向条纹，与南宝力皋吐此类器型纹饰风格相似，唯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者微外侈口较少，多为敛口，有的出现了器耳。南宝力皋吐M203：3直壁微敛口，造型与东高台山T1M80填土出土同类器（高台山T1M80填土：3）接近。可见，南宝力皋吐直筒形深腹罐演变轨迹与偏堡文化是一致的，归根结底应当是与小河沿文化筒形罐由早期的腹壁外敞向中后期直壁内敛发展是一致的^[33]；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的叠唇罐，口部贴附一周堆纹，堆纹与唇缘连为一体使呈三角形，口沿内壁抹斜呈侈口，器腹中部微鼓，腹部最大径向下在器高的二分之一下，腹部纹饰为竖向直条状堆纹间以竖向波曲形堆纹，除双耳外与偏堡文化Ⅲ式接近（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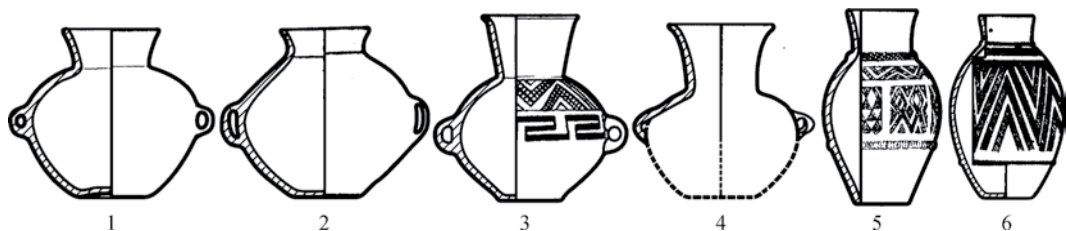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南宝力皋吐与偏堡、小河沿文化的陶罐

1. 南宝力皋吐M216：3 2. 偏堡子遗址（原报告图三，3） 3. 南宝力皋吐M203：3 4. 东高台山T1M80填土：3
5. 南宝力皋吐M174：2 6. 石棚山M22：1 7. 南宝力皋吐M122：2 8. 石棚山M34：4

南宝力皋吐墓地出土的陶壶根据是否有器耳分为两种，其中的有耳壶有短颈和长颈二型之别，它们均为小河沿文化典型器^[34]。其中M121：1短颈，球腹，与小河沿文化上店遗址M1：1特征一致，属于小河沿文化早期器型。M168：1，长颈，唇缘出现了外翻，圆腹，底部出现了内收，与小河沿文化石棚山遗址M27：7特征一致，属于小河沿文化中期器型。无耳壶M177：1有较长的斜直颈，颈肩交接处有一周附加堆纹，溜肩，腹部呈瘦长椭圆形，饰复线几何形刻划纹，纹饰下复饰一周附加堆纹。除颈部更长外，与东高台山80T1⑤：1相似（图一二）。

从以上具偏堡文化特征陶器共出情况看，偏堡文化曾与属于辽西区的小河沿文



图一二 南宝力皋吐与偏堡、小河沿文化的陶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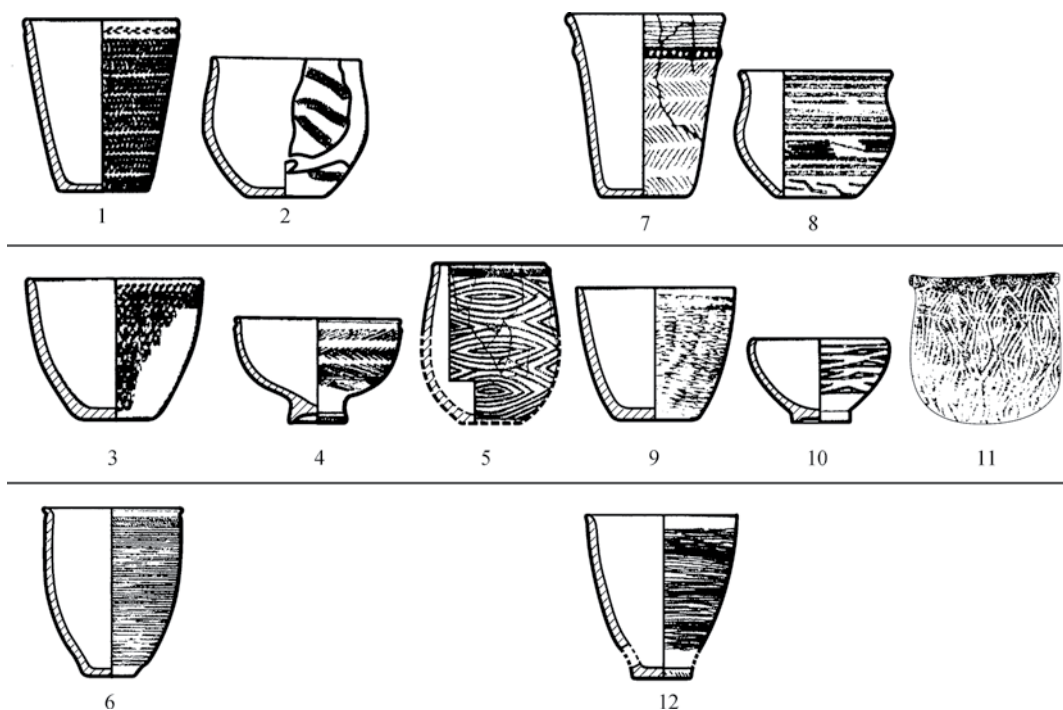
1. 南宝力皋吐M121 : 1 2. 上店M1 : 1 3. 南宝力皋吐M168 : 1 4. 石棚山M27 : 7 5. 南宝力皋吐M177 : 1
6. 东高台山80T1⑤ : 1

化，辽东区后洼上层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和小珠山上层文化共存过。但是这里有一点是一定要注意的，即上述所有具偏堡文化特征的陶器其所谓特征均为该文化第二、三期陶器特征。故此，偏堡文化早期的相对年代就应当还要早些，其时代至少应当早于辽东的后洼上层文化早期，后者有一个 ^{14}C 数据，为距今4465年 ± 90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3091~前2897年），但是考虑到后洼上层文化包括后洼遗址第2、3层，而上述数据是在第2层获得的，所以该文化的早期年代有可能会到公元前3500年左右。根据孙祖初研究的结果，后洼上层文化早期约当红山文化中期阶段^[35]。由此，我们认为偏堡文化早期的年代应当早于公元前3500年，如果考虑到三堂遗址F3下尚有原报告称作的同属于“一期文化”的第6层堆积，就有理由相信其可能延续过相当一段时间，其时代有可能会到公元前4000年甚至更早。

三、谱系考察

在偏堡文化范围内及周边，早于偏堡文化的考古学文化有新乐下层文化、后洼下层文化、小珠山下层文化。

从目前已有的绝对年代数据看，新乐下层文化^[36]有距今6150年 ± 95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5034~前4782年）、距今6335年 ± 95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5234年~前4946年）、距今6620年 ± 150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5490~前5240年）和距今6145年 ± 120 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5048~前4770年）四个数据，大致都落在公元前5500~前4700年。但是尽管历次发掘报告对该文化遗迹、遗物的公布均不完整，给进一步分期带来很大的困难，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对该文化陶器的分析，看出其具有分期的可能性，并对其延续的年代问题提出一些看法。在新乐下层文化的陶器中，我们能够看到它与多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曾经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关系（图一三），包括兴隆洼文化^[37]、赵宝沟文化^[38]和后洼上层文化等，显示该文化的相对年代从兴隆洼文化末期一直可以延续到后洼上层文化的早期，较其 ^{14}C 测定的年代下限略晚一些。这样，新乐下层文化与偏堡文化就应当有过一个平行共存的阶段，它不应是后者的直接来源。



图一三 新乐下层文化与周边文化陶器比较

1. 新乐T1:1 2. 新乐T1:120 3. 新乐F2:13 4. 新乐F2:15 5. 新乐F2:546 6. 新乐83〇六F4:4 7. 查海F36:73 8. 查海F20:1 9. 赵宝沟F5②:5 10. 赵宝沟T106②:7 11. 上宅出土(图三, 12) 12. 后洼IT8②:88

从偏堡遗址报告图三的3大口深腹罐与新乐下层文化微鼓腹筒形罐造型接近情况看(图六, 1、2), 其可能是该文化进入中期阶段, 与新乐下层文化发生接触后产生的新器形。这也印证了上文分期中提到的大口深腹罐并非偏堡文化的传统器形, 其在偏堡文化的中期才开始出现。

后洼下层文化^[39]¹⁴C年代测定数据有五个, 分别是距今5410年 $\pm$ 150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4331~前3828年)、距今5600年 $\pm$ 110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4370~前4159年)、距今5525年 $\pm$ 120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4350~前4040年)、距今5560年 $\pm$ 180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4457~前4003年)、距今5515年 $\pm$ 90年(树轮校正值为公元前4341~前4042年)。综合上述数据, 该文化应当在公元前4400~前4000年, 有可能早于偏堡文化早期。该文化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和红陶为主, 其次是黑褐陶。均含滑石粉, 手制。纹饰分压印纹和刻划纹两种, 刻划的纹样有席纹、网纹、“人”字纹、竖线纹和横线纹。器形主要有罐、壶、碗、杯、勺和舟形器等, 其中罐和壶上腹及肩部经常有对称的瘤状耳。其陶器特征与偏堡文化早期相比(见表二), 相似点主要表现在陶质、陶色和制作方式上, 但前者不见泥质陶。二者纹饰和器物造型的差异明显, 前者没有可演变出后者繁复的附加堆纹的迹象, 虽然都以罐、壶和碗钵类为主要器物组合, 但实际器型相差甚远, 后洼下层文化为直口深腹筒形罐, 与偏堡文化的叠唇罐和大口直

腹罐作风截然不同,同样不具有内在联系,陶壶的区别也较大。所以,这两种文化的主体内涵不具有承接关系。

表二 后洼下层文化与偏堡文化早期陶器特征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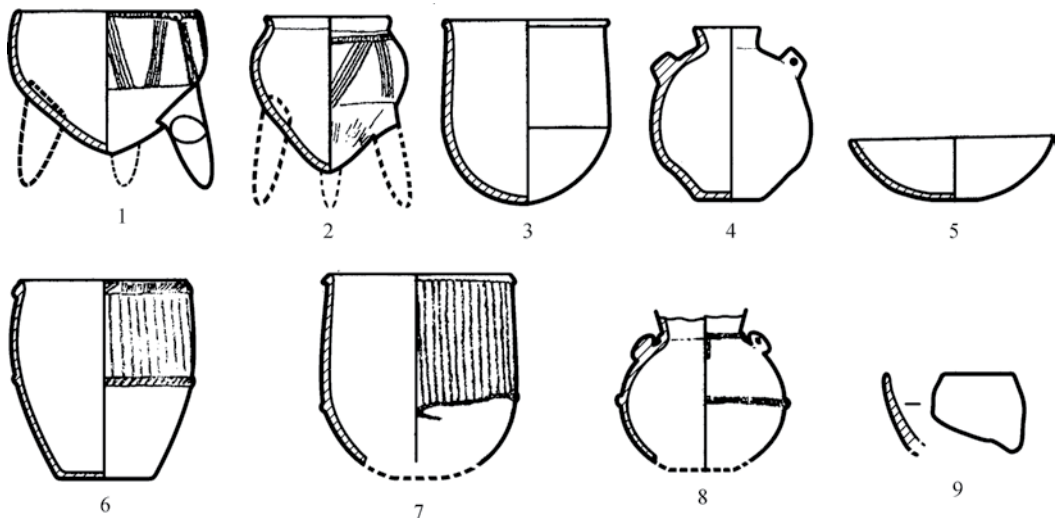
	陶质	陶色	制法	纹饰	典型器
后洼 下层文化	夹砂,均含滑石粉	红褐陶和红陶为主,其次是黑褐陶	手制	压印纹和刻划纹	直口深腹筒形罐、壶、碗、杯、勺和舟形器等
小珠山 下层文化	夹砂,均含滑石粉	以黑褐陶为主,红褐陶次之	手制	压印纹	直口深腹筒形罐
偏堡文化 早期	多夹砂,属加滑石粉,极少为泥制陶	红褐陶为主,灰褐陶次之	手制	以附加堆纹为大,划纹	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大口直腹罐、壶及钵

小珠山下层文化^[40]本身目前尚没有可供参考的¹⁴C数据,但有学者认为其陶器上施加的短促而缜密的压印“之”字纹风格与赵宝沟文化的“之”字纹非常接近,年代应与后者相当,绝对年代可达公元前4500年以前^[41]。如是,其从年代上说,也应该具备成为偏堡文化前身的可能性。小珠山下层文化的陶器,以夹砂黑褐陶为主,其次为夹砂红褐陶,均含滑石粉,手制。纹饰主要是压印纹,有压印的席纹和“之”字纹。器型单一,仅直口深腹筒形罐一种。与偏堡文化早期相比(见表二),陶质、陶色与制法有接近之处,但前者同样缺乏泥质陶。纹饰和器型具有鲜明的区别,深腹罐明显不属于同一系统。因此,二者的主要陶器也不具有内在联系。

这样,我们基本排除了偏堡文化来源于当地上述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可能性。经综合比对,并考虑偏堡文化具有以筒形罐为炊器的东北文化传统,我们认为偏堡文化是本地文化接受黄河下游地区的北辛文化影响而生成的一种新考古学文化。此观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其一,北辛文化从地域上看,无论先民抑或其影响,都有进入偏堡文化分布区的可能性。北辛文化的遗址遍布于鲁中南、鲁北、胶东及苏北地区,其中鲁北和胶东地区隔渤海与辽东相望,两大区域间远古文化的交流早已为学术界公认,早于北辛文化的后李文化即有了远涉重洋到对岸异域开发的经历;其二,北辛文化从年代上看,早于偏堡文化早期。北辛遗址的早期堆积年代为公元前5875年,晚期遗存年代在公元前4550~前4350年;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偏堡文化早期陶器诸多重要因素均与北辛文化存在着密切的承接关系,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北辛文化具备几乎所有组成偏堡文化早期陶器特征的要素,包括陶器多褐陶,以夹砂(包括含大量夹云母陶和夹滑石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陶,手制,纹饰中窄条状堆纹极富特征,同时尚有划纹、指甲纹

等。由鼎、釜、壶、钵组合而成的基本陶器组合中,壶与钵为偏堡文化早期陶器也同样存在的器型,北辛H1002:12与东高台山80T1M84填土中出土的同类器很相似,北辛H1001:22与三堂IIF3上:16口沿部分也存在可比之处,其间可能存在的承接关系比较明显。北辛文化的鼎与釜貌似与偏堡器型相距遥远,但仔细分析,二者关系也还是清晰的。北辛文化的鼎不仅数量多,形态也多种多样,根据鼎身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钵形、罐形、釜形、盆形、盘形和壶形等。其中的钵形鼎多直口或微敛口,口部外侧多施加一周锯齿状窄堆纹,深腹,上腹部鼓起,下收圜底,腹部则多以数条纵向窄堆纹为一组组成不同的纹饰加以装饰。以北辛H706:7为例,口外侧一周锯齿状窄堆纹和两两对称的小鼻四个,鼎腹深近于口径。如果忽略此类鼎的三足部分,则与偏堡文化早期叠唇罐微侈口圆唇、口沿外附加一周堆纹、堆纹以下腹部即开始外鼓、上腹部饰竖向窄堆纹的特征非常相像。对于前者进行一定的改造,加深器身部分,改圜底为平底,即可以演化为后者。北辛文化的罐形鼎,折沿,器腹上部鼓起,之后收下垂尖圜底。以北辛H701:13为例,折沿,颈部施一周附加堆纹,上腹外鼓,施由数道纵向附加堆纹组合形成的纹样,深腹下垂,尖圜底。忽略其下三足,改折沿为抹口外侈,改尖圜底为平底,则北辛罐形鼎也具有演化为偏堡文化早期叠唇罐的基础。北辛文化釜也是式样繁多的,有盆形釜、大口釜、筒形釜、罐形釜等。其中的筒形釜大口、直壁、深腹,与偏堡文化大口直腹罐有相似之处^[42]。所以北辛文化陶器具备偏堡早期陶器器型的祖型特征(图一四)。

经过上文分析,我们得出偏堡文化的早期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其是在辽东半岛南端渤海沿岸使用罐为炊器的集团与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向北扩张越海北进的一



图一四 北辛文化与偏堡文化陶器比较

1. 北辛H706:7 2. 北辛H701:13 3. 北辛H702:1 4. 北辛H1002:12 5. 北辛H1001:32
6. 三堂IIF3上:19 7. 东高台山80T1⑤:25 8. 东高台山80T1M84填土 9. 三堂IIF3上:16

支相遇,接受了后者的强烈影响形成的以条形附加堆纹、叠唇罐、大口直腹罐、壶、钵为陶器主体的考古学文化。关于当地使用罐为炊器的原始居民文化,我们倾向于认为其并非是非后洼下层文化而应当是更接近于小珠山下层文化这样面貌单纯的文化,只有这样,才会既基本采用北辛文化器型作为陶器主体组合,又在罐形炊具上体现东北传统。偏堡文化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在其发展过程中,与后洼上层文化、新乐下层文化、小河沿文化、小珠山中层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发生接触,丰富了自身的文化内涵,陆续出现了大口深腹罐、复线几何形刻划纹等因素,同时也对上述文化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但其陶器基本组合始终得到了保持,与当地由压印纹筒形罐为代表发展起来的考古学文化传统形成鲜明的对比。

附记:在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郭大顺先生的指导与帮助,在此深表感谢!

注 释

- [1] 东北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新民县偏堡沙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J].考古,1958(1).
- [2] a.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东高台山第二次发掘[J].辽海文物学刊,1986(1).
b.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新民高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J].辽宁文物,1981(2).
- [3] 李晓钟.沈阳新乐遗址1982~1988年发掘报告[J].辽海文物学刊,1990(1).
-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工作队.沈阳肇工街和郑家洼子遗址的发掘[J].考古,1989(10).
- [5] a.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旅顺博物馆.辽宁省瓦房店市长兴岛三堂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92(2).
b.张翠敏.论三堂一期类型筒形罐[A].辽宁省博物馆馆刊3[C].沈阳:辽海出版社,2008.
- [6]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考古学系,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瓦房店交流岛原始文化遗址试掘简报[J].辽海文物学刊,1992(1).
- [7] 王枫.瓦房店市猴山遗址调查[J].大连文物,1993(1).
- [8] 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4(3).
- [9]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1994(10).
-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长海县小珠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考古,2009(5).
- [11] 朱凤瀚.吉林奈曼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考古,1979(3).
- [1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科尔沁博物馆,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扎鲁特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葬[J].考古,2008(7).
-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本溪市博物馆.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R].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 [14] 许玉林, 杨永芳. 辽宁岫岩北沟西山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2(5).
- [15] 许玉林. 辽宁东沟县石佛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0(8).
- [16] 韩嘉谷. 环渤海考古学文化变迁刍议[A]. 考古学文化论集4[C].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7.
- [17] 朱永刚.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A]. 青果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成立二十周年考古论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18]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新民高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J]. 辽宁文物, 1981(2).
- [19] 此类罐口沿在三堂遗址发掘报告中与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一并被归入筒形罐范畴, 但从细部观察, 其与叠唇附加堆纹深腹罐相比, 后者口沿内壁抹斜, 使口缘外堆纹突出部分对应的内缘向内凸弧, 进而做出微束颈后的向下鼓腹器身, 而前者口沿内壁不做抹斜, 没有微束颈造型, 口沿下即较直的器腹. 所以二者应当是有区别的, 参考东高台山遗址器物情况, 判断此类器物应为与东高台山80T1⑤: 25相类的大口直腹罐.
- [20]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新民高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J]. 辽宁文物, 1981(2).
- [21]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新民高台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和墓葬[J]. 辽宁文物, 1981(2).
- [22] 新乐下层文化的相对年代跨度约自兴隆洼文化末期延续到后洼上层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早期), 详见后文.
- [2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溪市博物馆. 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24]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溪市博物馆. 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25]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本溪市博物馆. 马城子——太子河上游洞穴遗存[R].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4.
- [26] 许玉林, 傅仁义, 王传普. 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J]. 考古, 1984(1).
- [27] 辽宁省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 大连市郭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J]. 考古学报, 1984(3).
- [28] 许玉林, 杨永芳. 辽宁岫岩北沟西山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2(5).
- [29] 许玉林. 辽宁东沟县石佛山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90(8).
- [30] 朱永刚. 辽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含条形堆纹陶器遗存研究[A]. 青果集——吉林大学成立二十周年纪念文集[C]. 北京: 知识出版社, 1993.
- [31] 朱凤瀚. 吉林奈曼大沁他拉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J]. 考古, 1979(3).
- [3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科尔沁博物馆, 扎鲁特旗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扎鲁特南宝力皋吐新石器时代墓葬[J]. 考古, 2008(7).
- [33] a. 张星德. 小河沿陶器分群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b.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赤峰市博物馆. 大南沟——后红山文化墓地发掘报告[R]. 科学出版社, 1998年.
- [34] a. 张星德. 小河沿陶器分群研究[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2006(5).
b. 克什克腾旗博物馆. 克什克腾旗上店小河沿文化墓地及遗址调查报告[J]. 内蒙古文物考古,

- 1992 (12) .
- [35] 孙祖初.论小珠山中层文化的分期及与各地比较 [J].辽海文物学刊, 1991 (1) .
- [36] a.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新乐遗址试掘报告 [J].考古学报, 1978 (4) .
b.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沈阳故宫博物馆.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 [J].考古学报, 1985 (2) .
c.沈阳新乐遗址博物馆,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辽宁沈阳新乐遗址抢救清理发掘简报 [J].考古, 1990 (1) .
d.李晓钟.沈阳新乐遗址1982~1988年发掘报告 [J].辽海文物学刊, 1990 (1) .
- [37] 辛岩, 方殿春.查海遗址1992~1994年发掘报告 [A].辽宁考古文集 [C],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 [38] a.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敖汉赵宝沟——新石器时代聚落 [R].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b.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考古四十年 [Z].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0.
- [39] 许玉林, 傅仁义, 王传普.辽宁东沟县后洼遗址发掘概要 [J].考古, 1984 (1) .
- [40] 辽宁省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 长海县文化馆.长海县广鹿岛大长山岛贝丘遗址 [J].考古学报, 1981 (1) .
- [41] 赵宾福.东北石器时代考古 [M].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3.
- [42] 吴汝祚, 万树瀛.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 [J].考古学报, 1984 (2) .

Pianpu Culture Pottery Staging and Relative Problems

Zhang Xingde

Around 4000 B.C., the group who used pots for cooking along the coast of the Bohai sea in the south of the Liaodong Peninsula was influenced by the northward Beixin culture on the lower reaches of the Yellow River, forming the Pianpu culture which took overlapped lips jars with the strip-type additional heap pattern, big mouth straight ventral jars, pots and bowls as its main body. Pianpu culture experienced a long historical period, which,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potte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During the period, by contacting with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s, such as the Houwa upper culture, the Xinle lower culture, the Xiaoheyuan culture and the Xiaozhushan middle culture and so on, there appeared big mouth deep belly jars with complex line geometry engraved lines and other new factors.